

## 何以为邻？

### ——“跨境民族”之关键概念辨析与研究范式深化\*

施琳

**内容提要**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下，边境领土的开发和利用逐渐迈入了新时期——传统的以“防御（守护）”功能为主的边境区域向新的“多功能”型国际性边境空间拓展。边境之“变”也引发了边境研究的变化，从以往侧重静态研究与边境的“区隔（管控）”性质，愈来愈转向重视动态研究与强调“跨境”和“流动性”等概念。与跨境、流动性、治理、发展等紧密相关的“跨境民族”研究，已成为多学科研究者高度关注的主题。当前，国际上跨境民族研究新趋势是：从“边界”向“跨界”视角的转向，从“边境”向“跨境”视角的转向，以及从“边民”向“跨境民族”视角的转向等，其中跨境民族概念较为切合当下的理论分析与现实需要。就研究方法而言，“宏观变量分析”与“边境民族志”两大研究范式颇具代表性。中国学者在进行跨境民族问题研究时，需“回归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本身”，敏锐地认识到边境之“变”，提升对于跨境民族等关键概念的辨析水平，有取舍地吸纳国际上跨境民族研究范式前沿成果，加快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眼光”“中国特色”的边境人类学，从而深化中国的跨境民族研究水平。

**关键词** 跨境民族 概念辨析 研究范式 宏观变量分析 边境民族志

**作者简介** 施琳，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人类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1）。

---

\* 本研究为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民族志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7ZDA155）阶段性成果，并获得中央民族大学2019年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之社会学一流学科经费资助。

## 引子：从边境之“变”谈起

在20世纪中期之前，大多数国家的边境线是基于漫长历史时期的遗留、自然地理区隔，或者通过谈判与国际法的力量所划定的。国家主权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各国固守疆域，当时边境地区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军事防御与实施其他控制防范措施。20世纪中期之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信息通讯技术、高速交通技术和大量新军事技术（含宇航空间技术等）的普及使用，边境领土的开发和利用逐渐迈入了新时期。

在和平环境下，传统的以“防御（守护）”功能为主的边境区域悄然发生了变化，新的“多功能”型国际性边境空间蓬勃兴起。一般而言，国家政治越稳定，国与国之间的双边或者多边关系越和谐，其边境地区越能够发挥各种潜质。这突出地表现在，原先边境地区被视为各种不利条件的“偏远（相对于国家中心区）”“落后（待开发）”“贫穷（劳动力廉价）”等情势，在新时期向优势因素转化，边境对人口、信息、经济资源（包括资金和原材料）、产品和市场的吸引力日盛，因而逐渐成为国际工业布局与城市化发展的热点新区，该趋势在西欧国家之间边境、美国-墨西哥边境等表现得较为典型。<sup>①</sup>不仅如此，与传统边境区域相比较，新兴的国际化边境区域一方面继续维持着重要的“防御保护”功能，另一方面具有越来越突出的“渗透性”与“融合性”，吸引大量人口、资金、资源与信息的集聚、交换和快速通过，同时在国际商贸、国际物流、国际劳动力交换、国际环保合作、国际交通运输和边境城市治理等方面出现了各种新型互动合作。边境自身发生的深刻变化引发了边境研究的变化——从以往侧重静态研究和关注边境的“区隔（管控）”作用，逐渐转向愈来愈重视动态研究和强调观察边境地区丰富的“流动性”（Mobility）现象与“跨境”（Trans-border）概念。

近年来，与全球化发展、边境治理、跨境、流动性等紧密相关的跨境民族研究，日益成为国内外学界热议的主题，政治学、民族学、人类学、经济

---

<sup>①</sup> [美国] 劳伦斯 A. 赫佐格：《在全球城市时代的国家化城市结构：美国-墨西哥边境大都市》，李芳、高春茂译，载《国外城市规划》1992年第6期，第23~31页。

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研究者对这一领域中的复杂表象展开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观察和分析。本文想要讨论的是当前跨境民族研究中两个重要的理论方法问题：一则，从新视角辨析“跨界民族”“跨境民族”与“跨国民族”三个关键概念，在梳理与比较过往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叠加了边境人类学的新思考，讨论从“边界”向“跨界”视角的转向、从“边境”向“跨境”视角的转向，以及从“边民”向“跨境民族”视角的转向，指出为何“跨境民族”概念更为切合当下的理论分析与现实需要，值得进一步提升关注度；二则，对于跨境民族研究范式深化问题展开新的讨论，拟通过对国际学术界典型案例的系统剖析，探讨“宏观变量分析”与“边境民族志”两种代表性研究范式，廓清其理论思路、方法特色与重要价值。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提出深化跨境民族问题研究之相关思考。

## 理论之“辨”：跨境民族关键概念的新思考

关键概念不仅可以高度凝练学科领域内最重要的研究对象，而且会对整体研究思路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关键概念的提出与界定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一切理论分析的基石。中国学术界刚开始涉猎跨境民族研究时，就对“跨界民族”“跨境民族”和“跨国民族”等关键概念的界定与辨析抱有很高热情，学者们进行过多轮次、多角度的热烈讨论：有的从“界”“境”“国”的字词语义进行辨别；有的尝试判断三个概念所指代的范围大小；有的思考（这些民族）是“被动（被边界所）区隔”还是“主动跨界”；有的则运用“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来衡量；有的“扫描”学术史，从概念分类与研究内容等进行阐述；<sup>①</sup>有的梳理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尝试以英文主题词反证词义与使用的恰当性。<sup>②</sup>通过对这三个关键概念的反复讨论，学术界逐渐形成了各有倾向性的看法，很多学者赞同使用“跨界民族”或者“跨境民族”概念，也有人认为“跨国民族”概念更为合理。独立来看，各个概念都有专门解释，似乎内涵和外延已经比较“清晰”了，但事实上，学者在研究中仍经

---

<sup>①</sup> 刘涛：《跨界民族的学术史扫描：概念、分类和研究内容》，载《广西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第12~16页。

<sup>②</sup> 李伶俐：《“跨界民族”相关概念厘定》，载《兵团党校学报》2018年第1期，第73~76页；方天建：《国外跨界民族研究述论》，载《民族学研究》2018年第3期，第73~76页。

常出现模糊理解与交叉混用现象。学界对关键概念的阐释与辨析仍需进一步深化,以期更准确地把握其核心内涵与外显特征,校正各种理解与使用上的偏移。

“跨境民族”概念被最先提出并得到了较多的认同与使用。<sup>①</sup>很多学者对“跨境民族”做过界定,虽然文字表述上有所差异,但一般认为,跨境民族实质上指的是分别居于国家边境线两侧的同一种族,或者说,就是同一种族跨国境线分居在不同国家,其民族名称、宗教习俗、语言文字等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二者基本上是共通的。<sup>②</sup>这种界定被认为是“狭义”的跨境民族,其内涵与外延基本与“跨界民族”相一致。还有一种“广义”的跨境民族,较为关注其迁移与流动性,认为跨境民族的地理分布不一定连在一起,也可能从居住的第二国继续迁移和跨国居住,<sup>③</sup>并且“在迁出数百年或更长时期以后,迁出的部分在当地有了一定的发展变化,他们或者受当地主体民族的影响,或者在发展中与原来的部分在某些方面产生了差异,在不少方面有了鲜明的个性,但是只要他们存在着统一民族互相认同的民族意识,就是跨境民族”。<sup>④</sup>不仅如此,还有一些学者指出,跨境民族不是简单被动地被国界阻隔,而是具有一定“主动迁移性”,或者说“国内民族因主体不同的需要(经商、学习、婚姻等)积极主动跨入他国境内”,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被视为国际移民的一种形态。<sup>⑤</sup>

“跨界民族”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提出,很快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赞同与使用。<sup>⑥</sup>跨界民族一般是指那些分布在国家边界线两侧的民族,他们往往具有相同的族源和相近的血缘关系,在语言、宗教、习俗等各方面基本共通,相互之间联系密切、互动性强,但是因为国界的分隔作用,具有不同的国籍与国家认同,在经济发展方面也有可能形成一定差距。其概念被简明地

---

① 1982年,范宏贵在《中国壮族与越南岱族、依族的古今关系》一文中较早使用了“跨境民族”。1984年,他在《中越两国跨境民族》(《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0期)与《中越两国的跨境民族概述》(《民族研究》1999年第6期)等文章中多次提及跨境民族概念。

② 姜永兴:《我国南方的跨境民族研究》,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0期,第31页。

③ 胡起望:《跨境民族探讨》,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第49页。

④ 葛公尚:《当代国际政治与跨界民族问题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⑤ 曹兴:《全球化时代的跨界民族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页;姜永兴:《我国南方的跨境民族研究》,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第31页。

⑥ 陈永龄:《北美印第安人的心声——介绍〈第四世界〉及其著者》,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第37~40页。

表述为在漫长历史时期中形成的、现阶段被国家边界所区隔,分布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交界地区,毗邻而居的同一民族。<sup>①</sup>因此,跨界民族具有三个要素或是三个特点:共同发源于一个(原生态)民族,现阶段仍保有相似的民族文化认同;基于国界划定,具有不同国籍;在地理分布上相邻或连片,存在着基于血缘、亲缘、文化共通的大量交流互动。<sup>②</sup>跨界民族的界定也有“狭义”和“广义”的讨论,前者主要限于前述所说的传统聚居地被国家疆界分隔,并且在边界两侧毗邻而居的民族,后者被认为可以涵盖“一切因政治疆界与民族分布不相吻合而跨国界居住的民族”。<sup>③</sup>也有学者更强调跨界民族“被边界分开(被动跨界)”的特点,认为“跨界民族是那些原来民族和其传统聚居地都被分割在不同国家内而在地域上相连并拥有民族聚居地的民族,跨界民族是被动(被不同国家政治力量)分割的结果。”<sup>④</sup>据此与自发主动迁移的国际移民(主动跨境)相区分。

“跨国民族”概念的提出,与前两个概念相比时间较晚、使用频次也相对少一些。<sup>⑤</sup>跨国民族主要指的是跨居两国或两国以上(不论是居于国界相邻的两侧,还是远离边境)、具有相同渊源的、基本保持着原有民族认同的人们群体。<sup>⑥</sup>学界一般认为,跨国民族概念比跨界民族与跨境民族所涵盖的范围更为宽阔,它既可以表述分布在边界线附近的民族,也可以指称那些在地理上跨越多国,甚至远隔重洋的民族,同时也更为强调这些特殊人群所具有的不同国家认同。近几年来,学界对跨国民族概念的关注度有所上升并引发了较多讨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跨国民族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跨越国家边界的同一文化群体,这种“跨边界”的特殊区位空间,决定了其特殊的存在形式——“跨国而居”。“跨国而居”又有三个核心内容,即所谓的“界限”“人民”和“国家”,分别指代的是跨国界、相同文化特征的民族/族群与所

① 金春子、王建民:《中国跨界民族》,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刘稚:《中国—中南亚跨界民族发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② 刘稚:《关于跨界民族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兼论中国与东南亚的跨界民族》,载《“东南亚民族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2003年版,中国知网中国会议数据库。

③ 葛公尚:《试析跨界民族的相关理论问题》,载《民族研究》1999年第6期,第1~5页、107页。

④ 曹兴:《跨界民族问题及其对地缘政治的影响》,载《民族研究》1999年第6期,第6~13页和107页。

⑤ 黎海波:《“一带一路”战略下“跨界民族”概念及其逻辑连接》,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25~29页。

⑥ 马曼丽:《中国西北跨国民族文化变异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在国与邻国等,跨国民族研究应面向边界、边民和国家三大要素,缺一不可。<sup>①</sup>不仅如此,跨国民族研究还逐渐区分出了两大板块,即以边界为核心区域的跨国民族研究和以远距离跨国移民为核心的问题研究。<sup>②</sup>

上述对“跨界民族”“跨境民族”与“跨国民族”三个关键概念的讨论,或从字词意思,或从其所表述的地理范围大小(如跨国民族涉猎的范围最广,跨境民族次之,跨界民族范围最小等),或从政治与文化认同来考量,或从民族国家的发展演变分析,是非常必要和有价值的,但若想触及概念“内核”,使认识达至新的深度与广度,还需要从新角度展开进一步探讨:

第一,跨境民族研究应正本清源,回归其“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无论是“跨境民族”“跨界民族”,还是“跨国民族”概念,最初和最主要的都是描述和分析某些特定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形成,其传统的聚居区被现代国家的边界所区隔,使得同一民族具有了不同国籍归属和政治认同,同时他们仍分布相近、毗邻而居,相互之间保有大量的亲缘与文化联系,因此他们往往通过各种方式跨越边界线,持续发生着互动往来。在这一意义上,“跨境分布的原生民族表象”始终是本研究领域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不应淡化或模糊焦点。而“在具体语词使用上,‘(国)境’‘(国)界’等大致相同,略微差别的是:‘境’侧重于空间范围,‘界’偏重于边界。二者其实不能分开言说。无境便无界可言,有境必有界,至少在国家范畴是这样。”<sup>③</sup>

诸多中国学者倾向于使用“跨界民族”概念,因为其范围小和最清晰、可以体现出“国界的准确性分割与毗邻性”<sup>④</sup>;也有学者支持使用“跨国民族”概念,因为其范围最宽,包容性强,可以较好地概括“那些跨国而居的文化群体”。<sup>⑤</sup>本研究认为,“跨境民族”概念较为切合当下的理论分析与现实需要,值得进一步提升关注度,主要因为与前两个概念相比,“跨境民族”概念有其独特价值,它不仅准确地表述出“靠近边界线(两侧)”“一定区域

① 周建新:《边界、边民与国家——跨国民族研究的三个面向》,载《广西民族研究》2017年第3期,第1~8页。

② 周建新:《封而不闭的民族国家——兼论跨国民族研究两大范式》,载《广西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第59~65页。

③ 彭兆荣:《论“跨境民族”的边界范畴》,载《百色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第25~32页。

④ 黎海波:《“一带一路”战略下“跨界民族”概念及其逻辑连接》,《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25~29页。

⑤ 周建新:《边界、边民与国家——跨国民族研究的三个面向》,第1~3页。

内”和“原生民族”三重意涵，始终聚焦“跨境分布的原生民族表象”这一最主要的研究对象，而且比其他两个概念更加强调“区域”分析维度，或者说主张将“民族表象”与“边境区域”更紧密地连接起来，既从边境区域发展的角度观察民族问题，亦从民族的角度分析边境区域的发展，这恰恰契合了近年来国际边境人类学的研究思路。

第二，跨境民族研究应更为关注边境之“变”。我们需要细致观察已经发生和正在加速发展的“边境新样态”，特别是国际性边境区域（亦称“跨国区域”）与多种跨境共生现象的出现，探究“变化了边境”对当地跨境民族带来的重大影响，以及“原生”跨境民族如何适应这种变化与实践新的“流动性”，从传统的静态分析向动态的跨境研究转型。

第三，跨境民族研究需要强有力的学科支撑，我们应充分吸纳国际边境人类学等新兴学科的前沿进展，从全新角度思考“边界-跨界”“边境-跨境”和“边民-跨境民族”。具体而言，20世纪中期以前，人类学家一般把边界简单地视为一条将不同文化与地域分开的“线”，其功用主要被视为“分割与区隔”。随着边境田野调查的开展与边境民族志的累积，“现实中的边界”在人类学家的视野里越来越清晰，他们对国家如何管控边界了解得更多、更细，同时越来越关注边界两侧不断发生着的多种互动联系，从而提出了新的“跨界”研究角度——边界不是隔绝的，边界线两侧的边境社区也不是孤立的（他们是相互联系的），边界不再是一条难以穿越的线，而具有“互渗性”。<sup>①</sup>与国家力量彰显、管控严密的美墨边境（“硬边界”）相比，在很多非洲国家边境看到的是有一定“弹性”的“软边界”，非洲国家对于边境地区的控制力相对较弱，边境管理松懈或不正规，生活于当地的众多跨境民族有着独特的自我认知与较多话语权，他们从历史上一直延续着紧密的互动关系，如尼日利亚-贝宁边境沙贝地区的跨境民族，用歌曲表达心声：“我们同饮一条河水，我们是兄弟姐妹，我们在一起”。<sup>②</sup>

边境地区最初也是被直观地描述为靠近边界线两侧的一定范围内（从直

---

<sup>①</sup> Linda Whiteford, “The Borderland as An Extended Community”, in Camara F, Kemper R., *Migration Across Frontiers: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79, pp. 60-161.

<sup>②</sup> Donna K. Flynn, “We Are the Border: Identity, Exchange, and the State along the Bénin - Nigeria Border”,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 24, 1997, p. 311.

线距离边界几公里到数十公里不等)的区域。边境地区的特殊性突出地表现在其生活方式与管理(与内地和其他区域)的差异性上——当地边民的生活有可能与国界另一侧的外国人(而不是国内其他地方的人)更相近,或者说边境具有某种“异域风情”,同时很多国家会将距离边界线较近的这片区域专门划区,实行特殊的边境政策与制度管理。<sup>①</sup>在生动描述边境区域人们生产生活图景的过程中,边境人类学研究者逐渐将边境进行了“广义阐释”,认为边境是由冲突和矛盾、物质生活与精神观念等所标识的边界所确定的特殊区域,包含该区域中人们的各种实践(行为)。<sup>②</sup>正是通过对于频繁穿越边境的人们开展追踪式研究,边境人类学者逐渐发现了“跨境”的多样性——有以移民定居为目的的跨境,有返回式跨境、重复性跨境、循环式跨境等,以及人们如何在具有两国社会文化特性的边境社区里安置自己的生活,换言之,“跨境”视角是一种典型的“动态”和“双向度”研究,它观察和深描多型态的“跨境行为”,不仅分析其为什么“跨境”?如何“跨境”?“跨境”的后果与影响是什么?而且进一步探究“跨境”现象背后所反映出的边境两侧存在的深层次互动联系。例如,非洲之角的跨境民族索马里族与“大索马里主义”、地缘政治不稳之间存在内在关联性。

边民一般是指那些居住在边界线附近一定区域内的常住人口。这一解释看似很“明白”,但其实存在着不少“未确定”内容且“弹性”很大:边民分布于边界线两侧,涉及国籍不同及其管理问题;而各国甚至一国之内,对如何划定“边界线附近区域”也经常存在着差异,直接影响到谁是边民和谁能享受边民政策等。此外,边民的构成不仅有当地世居人口,也有后来因各种原因移入或暂时停留在边境的人口。因此,“边民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从民族文化整体的角度看,边民群体有跨国居住的,也有不跨国居住的,因此边民并不一定属于跨国民族群体,但跨国民族群体一定是边民的重要组成部分”。<sup>③</sup>一般而言,边民的内涵会比跨境民族宽泛,但在某些特殊情境下,也可能出现“边民即跨境民族”或者跨境民族包括边民在内的情况。<sup>④</sup>

① 苗伟明:《边境管理学》,中国方正出版社,2010年版,第44页。

② Robert R. Alvarez, “The Mexican - Us Border: The Making of an Anthropology of Borderland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24, 1995, pp. 447 - 470.

③ 周建新:《边界、边民与国家——跨国民族研究的三个面向》,第3页。

④ 方天建:《论“边民”与“跨界民族”的属性关系问题》,载《广西民族研究》2018年第5期,第36~43页。



近年来，随着学者对丰富“跨境”现象的细致观察与定性、定量研究，学术界极大地拓展了“跨境”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亦促使跨境民族研究发生转向——“跨界地区”的概念变得日益重要，后者指的是一个由两国或多国相连的地带所共同构成的领土单位，其建设与发展不仅是哪一国关心的事情，而是“边界地区内外社会各界所追求的或多或少的战略目标”，而“开放的边界”成为“渠道”或“障碍”的“接触空间”，<sup>①</sup>换言之，“跨界地区”打造的是全新的边境生产生活空间，也是不同国家探索合作管理、共同发展的“试验田”，在这种新的“跨境”生态下，当地民族与边境的相互作用发生了深刻改变，因此，跨境民族研究需要叠加“跨区域”“流动性”与“共生性”的分析维度。例如，中国在非洲建设的“一带一路”旗舰项目——蒙内铁路，旨在打造东连肯尼亚、北通南苏丹、南达卢旺达的跨境铁路网，势必涉及相邻国家跨境民族地区经济带的协同发展问题。面对这些跨境民族的新问题，传统静态的边境研究显然难以满足要求，必须要有方法论上的新突破。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跨界民族、跨境民族与跨国民族三个关键概念的界定与表述侧重点不同，对于具体情境下的边境民族现象，各自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解释力，学术界的相关讨论还将持续下去，短时期内应不会出现以某一概念完全取代其他概念的情况；同时，关于这三个关键概念的辨析不能驻足于字词意义、范围大小等表层之辨，而应正本清源，真正回归“跨境分布的民族表象”这一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将“民族”与“边境区域”作更紧密地连接，同时深刻理解边境之“变”和吸纳边境人类学的新视角，以开展深层次的理论之“辨”。

## 方法论拓展：“跨境民族”研究的两种范式

世界各国和各地区跨境民族的表象丰富多型，不仅吸引了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者的目光，也引起他们对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地理学、区域与发展研究等多学科领域的关注。多学科的介入，使得国际跨境民族研究领域在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理论观点、研究思路等方面，均呈现多元化的

---

<sup>①</sup> Markus Perkmann and Ngai-Ling Sum, *Globalization, Regionalization and Cross-border Regions: Scales, Discourses and Governance*, Loughborough University's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2002.

发展态势，而“宏观变量分析”与“边境民族志”范式则是国际跨境民族研究中两种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范式。

### （一）“跨区域”与“大问题”：“宏观变量分析”研究范式

一直以来，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对于国际边境与跨境民族现象抱有浓厚兴趣。他们认为，国家认同在国与国关系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国内部的民族问题有可能对其外交政策产生影响，甚至触发边界纷争与军事冲突。正因如此，分析领土争端和民族关系对国际关系影响的研究一度较为流行，一些学者持民族问题“工具论”的看法，认为民族情感和民族利益诉求有时能被操控，可以利用其去获取领土或者达到影响他国政局稳定等目的。<sup>①</sup> 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学者们不再满足于仅仅将“领土/边境”与“民族”要素和“国际关系”相关联来阐述问题，而是力图将“民族”要素本身看得更深更细——具体分析民族内部样态（如民族人口分布情况）怎样影响国际边境冲突爆发等。2004年，美国耶鲁大学著名学者道格拉斯·伍德威尔发表的《不受欢迎的邻居：共享民族与冷战时期的国际冲突》，即为此类研究的代表之一，该文聚焦世界各国多样化的跨境民族人口及其民族矛盾对国际边境冲突的影响，运用多变量与“大数据”分析方法，勾勒出民族因素引发国际关系变化的宏观图景，并从中概括提炼跨境民族的普遍性规律，体现出“宏观变量分析”范式对于跨境民族研究的独特价值。

伍德威尔的研究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建立在近年来国际关系领域丰富的经验研究基础上，特别是吸收了把民族人口作为重要因果关系变量分析国内冲突的研究成果。其创新之处在于，尝试将民族变量与国际关系问题相关链接起来，指出国内民族政治对于外交政策制定产生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关键是如何产生影响及产生何种影响，因此，必须分析跨境民族规模大小和行为选择方式对国际关系的具体作用。

在伍德威尔的研究中，跨境民族首先是“共享的”，即国家边界两侧连续分布着的是相同的民族；其次，跨境民族是“分类的”，他划分出了三种分析类别，即跨境民族在两个地域相邻的国家中都是人口占优势的主体民族，跨

---

<sup>①</sup> M. Brecher and J. Wilkenfeld, "The Ethnic Dimension of International Crises", in D. Carment and P. James edited, *Wars in the Mist of Peace*,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7, pp. 164 - 193.

境民族在相邻两个国家里都是少数民族，以及跨境民族在一个国家里是少数民族，在另一个国家里是人口占多数的民族。<sup>①</sup> 据此，他提出了一系列想要验证的重要假设：其一，在“主体民族-少数民族”二元结构下，如果其中一方的少数民族近期陷入了武装纷争，国际边境武装冲突的风险会否大大增加？抑或不管有没有一国内部民族反抗斗争的卷入，国家间军事冲突也倾向于爆发？其二，在“主体民族-主体民族”二元结构下，如果边界两侧没有民族摩擦和抗争问题，是否两国间不太容易出现军事冲突？还是说这种结构本身就更容易引发国际冲突？其三，在“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二元结构下，与其他面临民族抗争的二元结构相比，不太容易出现较高的国际军事冲突风险（或者说这种结构较为稳定）；其四，在各种二元结构下，不论是否涉及跨境民族，国内民族纷争都可能会增加国际争端爆发的危险；其五，跨境民族与国际争端间存在着密切关系，这种关联性会随着冲突升级（如出现人员死亡等情况）而强化。<sup>②</sup>

要想验证上述假定，需要分析跨境民族相关的大量数据。伍德威尔首先面临着一个难题——如何才能将“民族”概念恰当地定量化。在他看来，一个公认的、界定非常准确的“民族”概念也许并不存在，因为民族认同不是随机出现的，而是有着具体的时空背景，并且受到民族体质、语言、宗教、文化习俗、历史记忆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因此，伍德威尔尝试把复杂的“民族”概念“简单化”，他紧紧抓住民族的“政治利益诉求”这一关键点，因为“民族”要素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取决于该民族群体能否在政治上有效地施加压力与影响。不仅如此，为了最大程度避免研究者自身观点偏好的影响，伍德威尔没有直接选用与研究主题直接相关的民族统计数据，而是选用相对客观的以国内政治为主要研究目标的第三方数据库，后者所涵盖的民族数据较为关注该族体潜在或者现实的政治影响。伍德威尔关于“跨境民族”的资料来源主要有“危机中的少数民族数据库”“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世界概况”“万哈宁民族/语言/宗教/种族分布数据”，以及“2000世界语言大全”等。通过这样的方式，伍德威尔筛选出了其研究所要分析的“相关”（Relevant）民族，并设计了完整严谨的“多变量”研究方案，以“国

---

<sup>①</sup> Douglas Woodwell, “Unwelcome Neighbors: Shared Ethnicity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during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8, No. 1, 2004, pp. 197-223.

<sup>②</sup> *Ibid.*, pp. 199-205.

际军事冲突数据库 (MID)”和“死亡人数 (FATAL)”为因变量,以“主体民族-主体民族”(MAJMAJ)、“少数民族-主体民族 (MINMAJ)”“少数民族-少数民族 (MINMIN)”等结构分类为关键变量,辅助以“民族异质性 (EHETHI)”“联盟 (ALLIES)”“能力比率 (LCAP)”“贸易依赖 (DEPENDLO)”“国际政府组织成员 (IGO)”等为控制变量,进行系统的模型研究。<sup>①</sup>

研究结果显示,跨境民族要素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在跨境民族人口属于“主体民族-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主体民族”两种二元结构下,邻国间更容易爆发边境领土争端,二者的价值观差异、人员伤亡等亦会加剧冲突程度;其次,在跨境民族属于“少数民族-主体民族”二元结构下,边界线一侧的少数民族(也即是另一侧主体民族的所谓“离散人群”),他们的境遇往往引起高度关注,其受到的各种不公平待遇(比其他二元结构)更易引起民族反抗和边境冲突;再次,在分析程度激烈、出现人员伤亡的国际边境冲突时,多个民族变量的因果关系性较突出,成为直接导致或者间接促使冲突升级的重要因素。

伍德威尔的跨境民族研究体现出“宏观变量分析”范式的主要特点与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研究视域宏大,主要着眼于“跨区域”和“大问题”,探讨的是大范围乃至全球性的跨境民族问题,在丰富史料和现状研究的基础上,侧重归纳和分析世界各地复杂多样的跨境民族所具有的共性与特点;其二,在“民族”要素定量处理方面深入思考,“民族”概念内涵广泛、表象复杂,如何在研究中将其进行“适当”的量化处理和分析,长久以来一直是令学界困扰的问题。伍德威尔等尝试将复杂模糊的“民族认同”问题简化和明确化——不再是笼统地讨论跨境民族问题,而是具体分析跨境民族人口规模与政治影响力大小、跨境民族在边界两侧不同的分布结构及其互动关系等问题,并提出预设性看法,再以一定历史时期实际发生的大范围数据进行验证和讨论;其三,一般而言,研究者自身的主观看法与偏好立场在“跨境民族”研究中难以完全避免,但此类宏观定量研究努力强化“科学性”与“客观性”——不是根据研究的主要问题和利益相关方来进行数据选择,而是依据更广泛与相对客观的“第三方”数据库,并使用依赖变量、关键变量与控制变量等多重变量进行计算,尽量控制与修正偏差值。

<sup>①</sup> Douglas Woodwell, *op. cit.*, pp. 205 - 223.

因此，“宏观变量分析”范式对于研究全球范围普遍存在的跨境民族问题具有独特价值，特别是有益于对跨境民族普遍性规律的认识与跨区域宏观发展趋向的把握。

## （二）微观田野的力量：“边境民族志”研究范式

近年来，国际民族学、人类学界日益关注边境与跨境民族现象，立足于田野调查的边境人类学研究逐渐兴起——从人类学“整体观”和“比较观”等理论视角出发，运用民族志等研究方法，观察与“深描”丰富多型的跨境民族表象，涉及边民生活、族群关系、边境冲突、跨国婚姻、跨境流动、民族认同和文化边界等广泛议题。边境田野调查与民族志研究，大大推进了学界对于不同类型边境及其跨境民族问题特殊性的认识，涌现出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艾尔温·斯塔托德等学者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就在美国-墨西哥边境区域进行广泛的参与观察和重点社区调查，其研究生动地呈现出“边境生活空间”及边境线两侧迥异的政治制度结构，<sup>①</sup>他还专门调查过不同族裔边境社区面对灾害时的应对方式问题，通过深入访谈了解“当地人”的真实看法，指出不同族裔社区之所以对于灾后救助方式有差异化的评价和选择，不仅与经济和效率相关，而且与传统社会结构、民族文化观念密切相关；<sup>②</sup>吉亨·维基耶沃顿等学者则对东南亚地区的跨境民族问题进行过多侧面的观察与分析，维基耶沃顿主编了《东南亚大陆的跨国界民族》一书，其中汇集了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等多国学者相关成果，包括缅甸与泰国边境的泰族、孟族、克伦族和苗族，以及中国与泰国之间分布广泛的傣族、泰族和跨境瑶族等，深入探讨了跨境民族的语言使用、族群认同、亲属关系、民族主义建构等问题。<sup>③</sup>

学界关于非洲跨境民族问题的研究也获得了很大进展，如堂娜·弗林的《我们就是边界：贝宁-尼日利亚边境的认同、交换与国家》<sup>④</sup>和卡罗拉·兰

---

<sup>①</sup> Ellwyn R. Stoddard, “The U. S. - Mexican Border as A Research Laboratory”, *Journal of Inter - American Studies*, No. 11, 1969, pp. 477 - 488.

<sup>②</sup> Ellwyn R. Stoddard, *Catastrophe and Crisis in a Flooded Border Community: 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Disaster Emergence*, Michiga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1961.

<sup>③</sup> Gehan Wijeyewardene, *Ethnic Groups Acrossnational Boundaries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0.

<sup>④</sup> Donna K. Flynn, “We Are the Border: Identity, Exchange, and the State along the Bénin - Nigeria Border”, *American Ethnologist*, No. 24, 1997, pp. 311 - 330.

提兹的《这是加纳人的土地!：西非边境的土地冲突》<sup>①</sup>等，特别是弗林的文章提供了一个“边境民族志”研究的典型案例——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谁是跨境民族？他们是如何跨居和从事跨境贸易的？他们的族群认同与“边境认同”是怎样形成的？他们对未来生活有什么期许？

弗林所思考的关键问题是：一个生活在国际边境地区的跨境民族，如何经由谈判和操控政治与文化边界，逐渐锻造出一种紧密的跨国边境认同的？为此，她进行了深入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并且遵循规范的民族志研究路径展开描述和讨论。弗林的田野点选在贝宁与尼日利亚交界的沙贝地区，1992年6月至8月和1993年10月至1994年10月，她曾两次对该地区的三个边境社区开展调查。弗林居住在贝宁境内的伊贝瑞（Ibere），每周跨过边界三到四次，到尼日利亚境内的奥格波瑞（Ogbori）访问那里的居民和进行观察，此外还规律性地到访另一个贝宁边境社区帕泊（Papo）。鉴于边境研究主题的敏感性和民族志写作的道德规范要求，弗林专门进行了技术处理——改变了所有边境城市/社区的名称，并模糊了调查社区的准确位置。作为一个在边境区域长期开展调查的研究者，弗林自己也变成了一名“边境人”，与当地一样，她每天要面对两国不同货币汇率的变动、海关官员的刁难，以及糟糕的交通状况和边境区域的语言交流不便等问题。她在进行访谈时经常会穿插使用三种以上的语言，包括法语、英语，还有沙贝约鲁巴语、风族语和豪萨语等民族语言。弗林以民族志的笔触生动地描述了“当地人”的群像及其行为，包括边界两侧的边民（分属不同民族）、海关人员、外来商人等，以呈现出他们是如何通过自我“划界”（与他者区分）并确立与“（国家）边界”的自我定位。

按照民族志研究的习惯方式，弗林首先介绍了沙贝边境的自然地理与历史沿革情况。该区域位于尼日利亚和贝宁交界处，以奥帕拉河为界河，每年有长达半年的雨季，使得河流泛滥，周边泥泞不堪，车辆与步行均难以抵达，唯有当地人能驾驶独木舟通行河面，运送乘客与货物。因此，在当地人的眼中，界河不是将人们分隔开来的“障碍”，反而是把人们连接起来的“桥梁”。

从历史上看，该段边界19世纪末期时是英属殖民地与法属殖民地之间的

---

<sup>①</sup> Carola Lentz, "This is Ghanaian Territory! Land Conflicts on A West African Border",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 30, No. 2, 2003, pp. 273 - 289.

边界，当时沙贝的约鲁巴族绝大部分划归到法属达荷美，但是有一部分沙贝东部的村庄划到了英属尼日利亚。因此，当地的约鲁巴族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被强行分成了两部分，而且最主要的是归属到贝宁一侧的约鲁巴族被迫与自己在尼日利亚的族人分隔，而与以前的世仇贝宁风族同属一国。对于这种划界方式，约鲁巴族极为不满，其社区领袖曾极力劝说法国殖民者不要如此划界，他们希望的方案是沿着沙贝西部的佐河划界，将整个沙贝区域划归英属殖民地，从而使约鲁巴族与风族分开。与此同时，沙贝国王也恳请尼日利亚的统治者替他们向英国殖民者说情，但最终各种斡旋和外交努力都失败了，约鲁巴族的意见无人理睬。最后，一批大胆的沙贝人干脆自己拿了主意，他们悄悄地挪动界碑，将其沿着佐河重置。<sup>①</sup>

在上述自然、历史背景下，弗林层层递进地开始阐述沙贝经济生活变迁与当地民族特殊“边境认同”的萌发过程。沙贝边界虽然最终被划定了，但是边界两侧千丝万缕的多种联系从未中断——基于民族、语言、宗教、文化、亲属关系、经济生活等联系的跨境互动十分频繁。诸如跨境通婚现象很常见，法属殖民地的人也常常跑到英属殖民地一侧来逃税，两国之间“赶集式”的非正式贸易非常活跃等。作为两国间一个重要的贸易集聚地，沙贝地区曾繁荣一时。起初，可可作为最主要的贸易品，尼日利亚商人将可可贩运到沙贝边界，贝宁、多哥等地的商人会前来采买，当地人主要从事装卸货物、做小生意等，后来石油与服装贸易取代可可的地位，但前者只是过境，不在边境地区停留很久，使得本地贸易逐渐萎缩，居民收入下降。另一方面，尼日利亚政府边境政策的变化也对沙贝地区产生很大影响，如在边境建立海关和派驻海关官员，打击非法贸易，设立全国边境委员会加强管控等等。面对边贸衰退、边境管控强化等各种变化，沙贝各民族通过锻造一种“边境认同”的集体意识来应对：这种认同基于当地人对于其“家园”的主观宣示，对共同经济利益的强调，以及认为自己有从事跨境贸易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上述特殊的“边境认同”是通过大量社会经济行为与跨境贸易被建构起来的，表现为沙贝地区各民族一直尝试在“自由跨界”地从事贸易与运输等活动，边界两侧的社区形成了紧密的跨境关系网络，相互依存。弗林所调查的三个社区的情况非常典型：当地人经常说“我们就是边界”，在他们看来，边界不是冷

---

<sup>①</sup> Donna K. Flynn, *op. cit.*, pp. 314 - 315.

冰冰的一条分隔线，而是活生生的社会群体，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他们“有权”进行跨境行为和从事贸易。跨境行为的合理与正当性来源于他们“深深地植根于这块土地”（deep placement and deep territorialization）。而边境人的政治经济权利也恰恰是从边境的“缝隙”中获得——他们通过控制和影响在边境区域内发生的各种行为，有效地连接起两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sup>①</sup>

根据细致的田野观察和深度访谈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弗林得出了重要看法：沙贝案例显示出，非洲边境与界限分明、管控严格的美墨边境存在巨大差异，而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可操作性”，这突出地表现在当地跨境民族“主体性”与“能动性”的发挥上，他们勇于面对自己所处的“边缘地位”，通过自主跨境与导控边境区域的社会经济行为，打造区域内部共同的“边境认同”，实践其“边境经济策略”。与此同时，尽管沙贝跨境民族对各自的政府实施的边境政策有诸多不满，并且认为后者的横加干涉与低效率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边境经济的困难与衰退，但在文化上，沙贝边境族群并未实现“混杂”，而是传承与实践着多元民族文化，在政治上他们也非常清楚并坚持着各自的“国家认同”。弗林指出，沙贝跨境民族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正是由于分属不同的国家，他们才可能经由商谈协作来操控边界，实现互利互惠。所以，他们自然地维系着某种跨境“双重性”——既分隔（民族文化多元），又统一（共同的边境认同）；既排斥（各种外来者），又包容（定居者融入）；既独立（分属不同国家），又相互依存（边界两侧融合）。<sup>②</sup>

沙贝案例体现了国际跨境民族研究领域另一种重要的研究范式——“边境民族志”范式，它在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方面亦具有鲜明的特点与优势：一则，研究视域较为聚焦，主要着眼于“小范围”中的具体问题，研究某一边境区域内的跨境民族问题并致力于完整呈现案例全貌；二则，从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整体观”理论视角出发，深入边境社区和族群开展田野工作，通过参与观察、访谈等方法广泛收集第一手资料，进行民族志“深描”与阐释。边境民族志对跨境民族现象看得既“深”又“细”，在当地自然地理与历史发展脉络的背景下，细致描述跨境民族的生产生活与互动联系；三则，“边境民族志”范式以批判性反思为特色，不是驻足于描述表面现象与细枝末

① Donna K. Flynn, *op. cit.*, p. 320.

② *Ibid.*, pp. 25 - 330.



节，而是深入分析现象背后的“关系”与“结构”，主张围绕第一手民族志材料展开理论讨论。如弗林所做的就是以三个边境社区的田野材料为基础，探究当地民族如何“深嵌”于边境？边境对当地民族意味着什么？跨境民族为何以及如何锻造出跨国“边境认同”？跨境民族为何具有多种“两重性”？等等。简而言之，“边境民族志”研究范式对于世界各地多形态的“跨境民族”问题具有独特价值，特别是有益于对某一区域内跨境民族的微观内涵与特征的分析，以及对特殊规律的认识与提炼。

### 关于深化“跨境民族”研究的思考

20世纪60年代，当时的美国政府投入了大量金钱人力，在美墨边境城镇搞“文化理解周”“好邻居”等多种场面热闹的项目，希冀增进双方理解，促进边境政治、经济、文化融合发展。然而，由于美方所持的民族中心主义文化观、高高在上的傲慢态度等，这些项目与活动未能取得预期成效。2004年，当伍德威尔以“宏观变量分析”范式探索冷战时期的跨境民族与国际冲突问题时，他的发现是：不论跨境民族人口在边境两侧属于“主体民族-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抑或是“主体民族-主体民族”等何种结构，由于各种政治诉求、经济利益争夺以及邻国间在安全与竞争方面的博弈，使得跨境民族往往成为“不受欢迎的邻居”。实际上，当下我们在面对边境之“变”与大量跨境民族新表象时，尤其需要重新思考“何以为邻”的关键问题，特别是思考应如何促进跨境民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创新。

第一，应着力于深化对“跨境民族”关键概念的理解、辨析与使用。“跨境民族”概念在当下具有其他概念难以替代的特殊重要价值，这主要基于三点考量：一是回归“最重要研究对象”的需要，跨境民族最关注的始终是那些“跨境分布的原生民族”，探究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边境区域发展的多重影响，这一研究主旨不应偏离、模糊或者淡化；二是强化“区域”分析维度的需要，尽管世界各国（甚至一国之内）的边境区域划定标准存在多样性与差异性，但边境区域的性质与特点是基本共通的，也即是国家边界线两侧一定纵深范围内的区域。跨境民族研究应当比以往更加重视“边境区域”概念，分析和比较多种类型的边境区域，以透视不同边境区域内各民族的内

在特点与规律性；三是对于“变化了的边境”开展新型跨境研究的需要，当下新的“多功能”型国际性边境空间蓬勃兴起，其“渗透性”越来越突出，大量的人口、资源、信息在此处集聚、交换与快速通过，边境区域日益成为国家之间的“特殊地带”，我们需要深刻理解边境自身所发生的这种深刻变化，观察和分析“变化了的边境区域”与“变化中的跨境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族际交往纽带一直存续的跨境民族，原本就存在着多种跨境联系与互动，在新的跨境流动、跨境共生的情境下，他们的适应与选择及其对边境区域发展的特殊影响。

非洲跨境民族提供了与美墨边境、西欧边境等地非常不同的案例——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非洲人的边界概念一直较为模糊随意，这与其游牧生产方式以及地广人稀的情况相关。基于历史原因，非洲形成了殖民列强所主导的非洲边界划分、极少考虑非洲的传统与自然边界，以及非洲各民族分布特点。因此，非洲各民族的传统分布状态被外部强加的边界所破坏，如西非的约鲁巴族被划分到尼日利亚与贝宁等国，南部非洲的绍纳族被划分到津巴布韦、南非等国。这种特殊的边界划分历史，使得非洲成为跨境民族最多的大陆。非洲各国的边境地区不仅存在着原生跨境民族问题，还大量充斥着外来民族、少数民族关系以及维护各民族利益诉求、巩固国家统一与边境安全等复杂矛盾，因此，非洲国家边境区域是研究跨境民族现象最有价值的田野沃土，对其“多型态”表象的观察与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化对跨境民族关键概念的理解。

第二，应着力于“跨境民族”研究范式的新拓展。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对于国外跨国民族的研究，虽然已经有民族学、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等多学科视角的介入，包括在非洲部分国家（如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国）进行的跨境民族历史发展源流与历程、跨境民族语言和社会文化、跨境民族经济与可持续发展、跨境民族与地缘政治、跨境民族人口流动与社会适应等研究，但是在理论提炼与研究范式探索方面仍相对薄弱，亟待加强中国学者对国际相关领域发展前沿的了解，打造更为精良的“方法库”，使我们对跨境民族问题的认识由表层走向深化。

前文阐释了目前国际跨境民族研究领域两种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范式，即“宏观变量分析”范式与“边境民族志”范式。前者研究视域宏大，着眼于“大范围”和“大问题”，侧重归纳和分析多点跨境民族所具有的共性与特

点，在“民族”要素定量化处理方面有所突破，能够将复杂的“民族认同”指标体系简化与明确化，并运用大数据和多组变量来控制分析偏差度，对于提炼跨境民族普遍性规律、把控宏观发展趋向极有助益；后者研究视域较为聚焦，主要着眼于“小范围”中的具体问题，立足于边境田野工作和对典型个案进行民族志“深描”与阐释，擅长从跨境民族现象的“具体细微”中映射和反思“深邃的理论”，对于提炼某一区域跨境民族的内涵、特征与特殊规律颇有价值。

非洲现有 54 个国家，各国边境地区在历史源流、边界形成过程、地缘政治关系、经济发展状况、跨境民族分布与文化特点等方面差异显著。据此，唯有植根于非洲国家边境地区的田野工作，积累丰富的第一手案例材料，才可能准确“深描”非洲跨境民族的真实样貌，厘清复杂表象背后错综复杂的动因与结构，深刻认识各段（边境）各族的多型特点；同时，亦需要开展宏观“鸟瞰式”的观察、定量分析与比较研究，以把握非洲跨境民族问题总体发展态势和普遍性特点。

第三，应着力于促进富有“中国特色”的边境人类学新学科的发展。跨境民族问题属典型的“复合型”“交叉型”问题，涉及民族源流、民族人口迁移、民族心理、民族认同、民族文化、民族经济、民族政治、民族宗教、民族关系等广泛内容。透视跨境民族复杂的多层表象，需要强劲的学科支撑——事实上，跨境民族研究已经引起民族学、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等的高度关注，上述学科借由多种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多侧面、多层次地探究了跨境民族现象。近年来，国际边境人类学获得了蓬勃发展，为跨境民族研究开辟了新的理论进路。

如前所述，边境人类学肇始于美墨边境研究。相关研究人员在美墨边境开展的大量田野调查获得了丰硕回报，他们过深入观察和分析边界两侧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经济转型与合作发展、跨境人口流动、灾害应对方式，以及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等，激发了美国人类学者反思传统的人类学概念和理论。边境人类学逐渐形成了全新的理论面向，特别突出的是关于“移民过程”与“跨境流动”人群的多点调查和追踪式研究，边境民族志的大量材料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边界线两侧活生生的“政治-经济-族裔”现实与跨境人群间的互动联系。此外，人类学者将美墨边境当作了观察不同民族与文化间冲突与融合的“试验田”，他们尝试从当地人的视角重新解读边境民俗文化

变迁、种族冲突、不公平现象等。边境人类学在理论视角与研究思路方面均取得一些重要突破：如其所主张的（边界两侧）“双向度”观察视角、（在政治经济之外突出强调）“文化视点”和“当地人视角”等，以及关于“跨境共生现象”、跨境人群关系网络和跨境民族主体性、行动性的前沿性探索研究等等。<sup>①</sup>

我们应吸纳国际边境人类学最新成果，加快探索具有“中国特点”的边境人类学新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为包括非洲地区在内的世界各国跨境民族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方法支撑。例如，我们应立足深度的边境田野调查，进一步聚焦“现实中的边境与跨境民族”，开展边境线两侧的“双向度”调研与比较分析，既综合考量宏观层面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的发展大势与普遍性，也撰写边境民族志，深究微观边境社区与具体跨境民族的细节表象与特殊性。可喜的是，当前中国学术界已经开始了“走进非洲”的历程，笔者曾8次赴非洲国家开展田野工作，在津巴布韦哈拉雷最大的黑人社区入户访谈，在埃塞俄比亚阿姆哈拉州的村庄参与观察，在尼日利亚阿布雷的“金融街”，与活跃的民间换汇者“打商量”等等，还专门到访过津巴布韦与赞比亚、博茨瓦纳、莫桑比克的边境地区，调研当地的民族关系和边境经济发展现状。当前，越来越多的民族学、人类学专业青年学者、学生到非洲国家开展田野调查和学习交流，他们近距离地观察和体验非洲社会与民族文化，撰写初步的民族志式研究成果。这些非洲田野工作和民族志资料虽稍显稚嫩，却是中国非洲研究“起飞”所必需的，其中，非洲边境民族志研究是亟待加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何以为邻？”是跨境民族研究中的“大问题”与“真问题”。20世纪60年代美墨边境“好邻居”项目的冷淡收场，或者西方学者将冷战时期的跨境民族推论为“不受欢迎的邻居”，绝非这一问题的唯一答案。当下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将进行不同地区国家间的政策沟通、贸易畅通、基础设施联通等项目合作，包括在非洲和亚洲国家边境地区，有助于一定程度上突破跨境民族间的地理区隔，促发新的跨境联系、跨境认同与和谐发展，从而为“何以为邻”的关键问题提供精彩的“中国答案”。

---

<sup>①</sup> 施琳：《边境人类学发凡》，载《广西民族研究》2017年第3期，第43~52页。

## How to be Neighbors?

### ——Analysis of Key Concepts and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Trans – border Ethnicity”

*Shi Lin*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ization, the exploration and use of the border territory have entered a new era. The border area, which is traditionally meant for separation and defense,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towards an international space of multi – functions. The change of the borderland triggers the change of the border research. At present,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ave been paid to the border dynamics and the concepts of “trans – border” and “mobility”, instead of the traditional static analysis of the “separation nature” of the border. The “trans – border ethnicity” study, which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rans – border, mobility,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became one of the topical issues in many disciplines. The perspective of current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 this regard is shifting from “border” to “trans – border”, from “borderland” to “trans – borderland”, and from “border inhabitants” to “trans – border ethnicity”. As to research methods, “macro variables analysis” and “borderland ethnography” are two representative paradigms. While conducting research of “trans – border ethnicity”, Chinese scholars need to keenly realize the change at the borderland, draw upon the latest outcome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y in this area, and speed up the establishment of borderland anthrop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an effort to uplift the “trans – border ethnicity” research in China to a higher level.

**Key Words:** Trans – border Ethnicity; Analysis of Concepts; Research Paradigm; Macro Variables Analysis; Borderland Ethnography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